

古代中国男人的时尚

鼻烟壶与佩饰收藏

杨永年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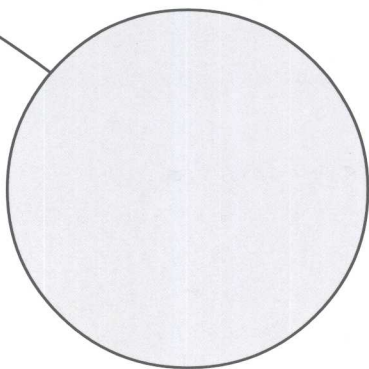
古代中国男人的时尚

鼻烟壶与佩饰收藏

杨永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代中国男人的时尚: 鼻烟壶与佩饰收藏 / 杨永年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308-05542-0

I. 古... II. 杨... III. ①鼻烟壶—鉴赏—中国②男性—
服饰—鉴赏—中国—古代 IV. K875.2 TS94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2135 号

责任编辑 李玲如

装帧设计 魏 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x1194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63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542-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 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002

『鼻烟壶』之再读

019

『板指』的兴衰复苏

024

『带钩』简史

032

满目琳琅说『佩玉』

上 篇

001/050



160

藏品『佩玉』赏析

127

藏品『带钩』赏析

099

藏品『板指』赏析

052

藏品『料类鼻烟壶』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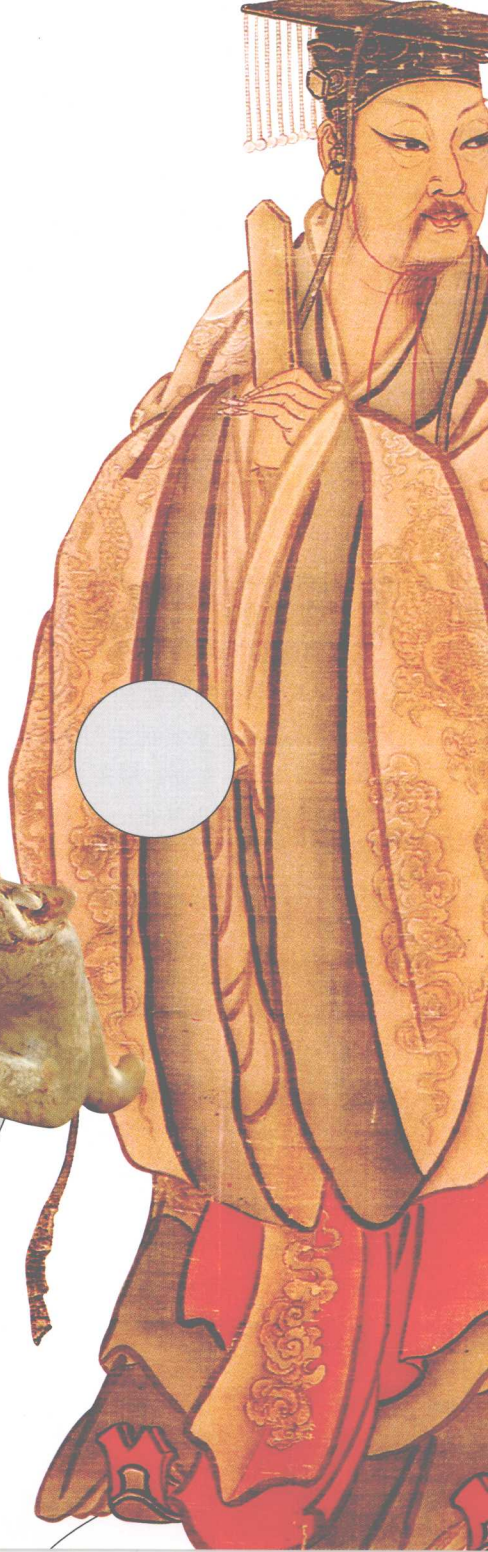
下篇

051/202





上篇



一、鼻烟壶之再读

所谓鼻烟壶之“再读”，即是有过鼻烟壶的“初读”。

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将“拦河网”似的收藏兴趣调整为专题收藏，首选便是鼻烟壶。在这之前，笔者确立了自己的收藏理念：审美第一，并且到处张扬：“值得收藏的不一定美，美的一定值得收藏。”中国鼻烟壶是最美的中国艺术品之一，可以算是中国艺术的缩影。它集中国绘画、书法、雕刻、碾琢和镶嵌等多种工艺和多种材质于一体，犹如一滴水可以映出一个太阳。把玩鼻烟壶，既可领略一种“风云在掌中”的无穷乐趣，又可享受众多可圈可点的审美体验。六七年下来，笔者居然从国内及海外的跳蚤市场中收集到四百余件鼻烟壶。2002年，笔者应辽宁画报出版社之邀，撰写了一本《鼻烟壶藏品赏析》。从拙藏中选出三百余件鼻烟壶，分为“瓷类鼻烟壶”、“料类鼻烟壶”、“玉石类鼻烟壶”、“竹木牙角杂项类鼻烟壶”、“内画鼻烟壶”、“微型鼻烟壶”、“联体鼻烟壶”、“肖形鼻烟壶”、“画珐琅鼻烟壶”、“蒙、藏地区的鼻烟壶”、“烟碟——鼻烟壶的姊妹”诸篇，分门别类地逐一进行“赏析”。此外还就几个相关鼻烟壶的话题表述了己见，重点谈了“初探鼻烟壶的价值界定和收藏取向”。之所以笔者要去“初探”，是受1994年在中国台北出版的《鉴别鼻烟壶》一书的译注者熊寥先生的启发。这本书是将1942年9月国内出版的、赵汝珍所著《古玩指南》一书中的两个章节“译注”而成的。熊寥在类似序文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赵氏著述，偏重于鼻烟壶的演绎和烟壶种类，与使用的介绍及其鉴别的一般常识，

而对烟壶自身的艺术内涵及其演化却未行涉猎。不仅赵氏著述有此缺陷，而且已出版的其他几本同样有此弊端。对此，只有期望后人补此不足。”作为著作此类图书之人，笔者应排在“后人”之列，当去“补此不足”，所以才有“初探”一文。拙文拉拉杂杂写了七八千字，出版后似乎还有点反响，海外的香港《大公报》用一整版、国内的《收藏家》杂志用六个整页各进行转载，在同好的鼻烟壶著作中也有所摘引。拙作《鼻烟壶藏品赏析》的生成，应是笔者对鼻烟壶的“初读”。

“初读”之后，笔者的眼球对“鼻烟壶”这三个字似乎生出了“磁力”。报刊上的短文要浏览，专家学者的讲义、文章和著作更是在解读之后来一番左右比较，上下推敲。笔者似乎感到，有些文章对“鼻烟壶”的一些概念表述不清，或概念混淆，界定模糊；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或似是而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一个中国鼻烟壶的爱好者和收藏人，笔者应该“匹夫有责”，于是便去“再读”一番。奈何此书不是鼻烟壶专著，是一台“弦乐四重奏”，笔者只得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再读”：①有关鼻烟壶的概念；②有关鼻烟壶的时尚故事；③有关料类鼻烟壶的“细读”。所配图的60件鼻烟壶亦全部选用拙藏料类鼻烟壶，是从笔者收藏的近百件料壶中精心挑选而出，而且几乎都是首次披露。故望衮衮读者诸公释念，笔者不是在此“炒冷饭”，骗购书人的时间和钱财。

有关鼻烟壶的概念解读

烟草与鼻烟

烟草的原产地在美洲大陆，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叶大有茸毛。其辛辣味能提神醒脑，所含的“尼古丁”有一定的药用功能。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有漫长的吸烟史。意大利作家贝佐尼在美洲印第安人中生活了14年，1565年意大利威尼斯出版了他的专著《新世界的历





史》。书中写道：“巫师们把烟草串在一起，挂在荫处晾干”，“让生病的人抽烟或吸闻鼻烟，用来治疗头痛、牙痛、咳嗽、胃疼、腰疼、心脏病、风湿病、被毒箭射中而引起的创伤”。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贝佐尼对烟草的功用是夸大其辞了，但他毕竟是最先向西方世界披露了美洲的“烟草”。鼻烟是烟草的一种再加工品，它有别于烟丝，是将优质烟叶去筋除水后，掺合芳香花草和一些医用植物，一齐捣碎成粉末状，再经发酵使之不用火燃成烟，而是直接吸食的一种“烟品”。

烟草是由葡萄牙船队首先带入欧洲的。1561年，法国派往葡国提亲的特使尼古特从葡萄牙把烟草带回法国，种植在自家的花园里。他用鲜嫩的烟草敷在友人的额际，为其治疗头疼痛。尼古特还把鼻烟奉献给皇太后和国王。国王的御医查帕林也开始在花园中种植烟草。很快烟草便在法国被称为“药草”。1570年，为纪念尼古特的“引进”之功，法国将烟草改称为“尼古丁那”。这便是后来人们称烟草中所含的无色油质为“尼古丁”的由来。

17世纪，众多疗效明显的药品还没在欧洲问世，于是以烟草当药在欧洲的多个国家流行。法国科隆的外科医生建议敷贴烟草来消除红肿。英国伊顿的市民，每天清晨都抽烟或吸闻鼻烟，进行“自我消毒”。17世纪末，欧洲蔓延鼠疫，人们更是将烟草作为一种消毒剂。奥地利教士阿伯拉哈在其1680年出版的专著中如是说：“1679年9月，居住在维也纳的市民们感到死神在发怒，而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在街上，到处可以看到抬尸体的人。但是，我也惊奇地注意到，一种被称为‘士兵们的植物’，即烟草，它能够防瘟疫。维也纳的市民们把烟草浸泡在酒里，约一小时，然后加入柠檬汁，喝了以后能预防病疫，特别是抽烟、吸闻鼻烟，可以预防污秽的充满病毒的空气的传染。”

皇室贵族当然也要防疫治病，但他们认为那种原生态的以火点燃烟草用烟管吸烟的样子太粗俗，很失身份，很丢面子，于是热衷于不点火不冒烟、用鼻吸食的“鼻烟”。吸烟是会上瘾的，慢慢地，吸食鼻烟成了上层社会的一种嗜好，一种身份代表，一种行为模式。史载：德国国王佛雷里克一世就是一位鼻烟嗜好者，在他辉煌的宫殿里，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有鼻烟盒供国王和贵族们享用。法国皇帝拿破仑也嗜

鼻烟如命，每月所吸食鼻烟多达七磅。俄国的彼得大帝不仅自己在赴西欧的访问中学会吸鼻烟，回国后立即大力倡导。到17世纪末，鼻烟已风行俄国。而英国的这种时尚似乎也“不让东风”。史载，1720年时，英国就有七千余家鼻烟销售商号，举国上下，无论是皇族还是骑士，无论是贵妇还是巨贾，都以手中精巧的鼻烟盒为炫耀品。

进入亚洲，流行中国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把烟草从欧洲传到日本。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把烟草从欧洲传到菲律宾（当时称吕宋）。随后烟草从日本经朝鲜传到中国北方；从吕宋经福建、广东进入中国内地。到明朝晚期，吸烟已开始在中国流行。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中写道：“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以致崇祯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吸食烟草。

如前所述，鼻烟在欧洲是皇室贵胄的喜好之物。因此鼻烟进入中国，首先叩开的是紫禁城的大门。应该说康熙皇帝并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他对鼻烟的“高贵出身”和“品牌效应”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当欧洲传教士汪儒望在觐见时，向皇帝献上四种方物，康熙只收下一种，那就是鼻烟。康熙是在中国推动吸食鼻烟和开发鼻烟壶产业的关键人物。杨伯达先生在为“玛丽及佐治伯乐鼻烟壶珍藏展”作序指出：“现存的文献、档案和实物说明，内廷鼻烟壶约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而极盛于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两帝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有闻鼻烟嗜好，他们祖孙三代最喜爱玻璃和画珐琅的鼻烟壶，并视若掌上明珠，爱不释手。”

应该说鼻烟的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流行长达三百余年，是西方生活元素最初在中国的交流，更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犹如20世纪末，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并蔓延神州大地一样。然而三百年前鼻烟壶的产生和其后的鼻烟壶所具备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对全世界的艺术张力，则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对一切外来文化的包容、借鉴和创新的结果。与此“鼻烟壶现象”相似的，是稍晚发





生在乾隆朝制玉中的“西番作现象”。乾隆爷被进贡的痕吉斯坦玉器的“工鬼更工仙”技艺折服了，提笔写下“西昆玉工巧无比，水磨磨玉薄如纸”的诗句，并下令宫廷作坊仿造。艺高胆大的中国玉人，很快消化吸收了痕吉斯坦玉器的工艺特征，“洋为中用”地制造出更胜一筹的“西番作”玉器，为中国的玉文化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上的两个“现象”，笔者以为，它一方面体现出统治者的开明开放对整个社会进步的影响作用，更凸显的是咱们中国文化所拥有的巨大笼罩力和强劲感召力。这种国家的软实力是不可低估的，是咱们中华民族面对整个世界能够高扬头颅的一项根本保障。

笔者以为，中国鼻烟壶的生成和“生生不息”的发展以及“永葆青春”的现状，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是“政府倡导”。好马要配金鞍，这对作为游牧民族的满人来说应该是最起码的认知。既然皇室是如此喜爱鼻烟，当成邦交的国礼，当成私享的精品，当成恩赏的重器，就得采用最好的“包装”。鼻烟壶的生产一开始就提上了皇帝的办事日程，有生产机构，有质检标准，有奖罚措施，这一切均可在“清档”中查找到。在宫廷鼻烟壶的制作中，还不时请来“洋专家”进行指导，这也是史料有所记载的。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在现今一些介绍鼻烟壶的文章中，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鼻烟壶的发生、发展作用似乎强调得过头了一点，好像这一切是他们“送”来的“技术”，特别是料类（玻璃）鼻烟壶和画珐琅鼻烟壶的生产制作。笔者对此认真查阅了一些资料，结合自己对中国玉文化的理解，认为外国人对清初料质鼻烟壶的贡献，仅在于对熔化玻璃料坯的熔炉作出了改造，对玻璃烟壶成型的管吹工艺进行了传授，而中国料质鼻烟壶的精髓，使之成为当今世界一项艺术品的根本，则是以琢磨工艺形成的鼻烟壶装饰。这种装饰的审美经验和操作技能，完全来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玉文化。这一点是世上任何国家的玻璃工匠都望尘莫及的。正因为如此，当中国的套料鼻烟壶一进入世界视野，立即引来无数艺术家、收藏家的“竞折腰”。即便是“画珐琅”这样的绝对的西方艺术，中国的鼻烟壶匠师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也没有“全盘西化”，而是从国人的审美习尚出发，来了一番“洋为中用”的改造。比如，画珐琅的作品中，虽有

来自西方的由透视产生的立体感，但却没有国人当时无法接受的强烈对比、浓重阴影和过强的高光，并且在整个画面的构图中，强调了传统中国画的线条作用。

中国鼻烟壶有三百年欣欣向荣之势的首个原因如果是“政府倡导”的话，第二个原因则是拥有“群众基础”。清代时尚消费的主流群体，应是满人和蒙人。游牧民族多有吸烟的习俗，他们希望有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烟类供其享受，比如不用明火点燃，能在风雨和旷野中使用。鼻烟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一生活诉求。既然扩大了“内需”，鼻烟壶当然会在“质”和“量”方面同步发展。第三个原因是有着“舆论支持”。清代大众舆论的“制造”与“经营”，主要来自各地的文人雅士，这类人群多崇尚并实践一种朴质、率直的超然纯净的修身态度。这样的人群标榜“清高”，追求由平凡的、生态的、自然的材质制造的用品。在这样的“舆论倡导”下，鼻烟壶的材质出现了“应有尽有”的扩容态势，鼻烟壶的装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缤纷局面，因而极大提升了鼻烟壶的艺术含量。可以说，中国鼻烟壶在造型上是新、奇、巧、绝；在工艺上是精、细、雅、秀；在材质上是珍、贵、稀、异。笔者以为正是由于拥有上述三个原因，才使中国的鼻烟壶保持三百年的“生生不息”——当扮演主角的单色玻璃烟壶和画珐琅烟壶随着清三代退出历史舞台后，套料烟壶及时在清代中期粉墨登场。到了清代晚期，瓷质烟壶和套料烟壶似乎都已“徐娘半老”，而内画烟壶的横空出世，一下子以它的绝色风姿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眼球。

称谓与包装的沿革

鼻烟刚进入中国时，其名称采用英文的直接音译，叫做“西腊”（SNUFF），也有以相似音称为“士那”或“士那乎”的。这样的称谓直到清末仍有使用，比如清末就有一本叫《士那补释》的介绍鼻烟壶的书籍。但相信这个洋名字并不讨皇室的喜欢，在《清档》的早期记载中就称为“鼻烟”和“鼻烟壶”。广大用户则更是如此，只呼中文名，不叫洋玩意，一点不像时下的一些时髦同胞那样，说话和写文章，总





是在中文行文中不时“镶嵌”出一两个洋名词！不过，“士那乎”这个洋名字最近倒是救了我一次“急”。2007年1月尾，迪士尼公园美国总部的一位高管来成都公干，笔者与他有过一次邂逅。笔者说自己已退休，现在的主要兴趣是古玉和鼻烟壶的收藏。同在车中有三个翻译，一个是美国人从上海带来的翻译，一个是北京相关公司派来的刚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国的年轻经理，一个是成都方派出的翻译，然而这三个翻译都译不出“鼻烟壶”的英文。笔者是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扯不清楚的人。骤然间双方的沟通变成一片死寂，颇为尴尬。我突然想起那个“士那乎”的鼻烟英文名，连说了两遍“士那乎”，美国人顿时反应过来，用手指作了个吸食鼻烟的动作，并佯装出“打喷嚏”的模样。相互的沟通又接上了，他告诉笔者，中国的鼻烟壶非常漂亮，他和他的妻子时常去旧金山的跳蚤市场找寻中国的鼻烟壶。笔者作为一个鼻烟壶爱好者，听到这些，虽未动声色，心里却是美美的。

鼻烟壶的由来应该说凡是对鼻烟壶有兴趣的人都是知道的，是为了将大盒鼻烟分包装，便于携带。但为什么称为“壶”呢？既无“壶流”，又无“壶把”，明明是小口大腹的“瓶”的造型嘛！对此，赵汝珍在1942年出版的《古玩指南》中有所提及，但笔者以为赵氏对此并未说清楚，失去“指南”意义。赵氏说，鼻烟壶是由原装的大瓶改装后用的瓶，‘如果再称‘瓶’，必定同西洋原装瓶相混，容易引起误会；如果叫做‘盒’，又与实际不符，于是称做‘壶’”。事过52年，杨伯达先生对此的解释，笔者是信服的。杨氏说“清内廷‘养心殿造办处’则根据满族皇室的需要，以其与马上生涯息息相关的盛水、酒的‘背壶’和‘扁壶’为蓝本制作了盛鼻烟的小扁瓶，并沿其原名称亦称之为鼻烟壶”。杨伯达还指出，“在康熙晚期形成了以内廷鼻烟壶、景德镇民窑鼻烟瓶及广州鼻烟盒三者并存的局面。”

中国鼻烟壶的世界影响

笔者认为，古往今来的任何一类中国工艺品、艺术品，其世界影响都不及中国鼻烟壶。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鼻烟壶具备实实

在的“全球买盘”，其收藏与研究的主流至今也在海外。

海外对中国鼻烟壶的追捧从19世纪下半叶已开始了。1880年，美国学者波谢尔在北京搜集到一件八卦图案的“套料”鼻烟壶，他说，“所有（玻璃手工艺）的技艺过程，实际上，在西方国家运用吹制、压或按、模制等技艺，是在中世纪形成的，是长久以来被知晓的。但是，琢磨，尤其是‘套料’——不同层次色彩的琢磨，是中国匠师们所创造的最新颖、独特的技法，而且取得了优雅的艺术效果。这些都远远胜过16世纪欧洲著名的波希米亚的玻璃手工艺匠师们”。1887年法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帕利奥洛格在巴黎出版《中国美术》一书，在这本拥有315页的洋洋大观之中，帕利奥洛格用了许多笔墨论述中国的鼻烟壶。他说中国鼻烟壶的品种很多，有玉器、瓷器、料器、铜胎画珐琅等。它和中国的其他美术一样，展示了中华民族独特和卓越的艺术才能。鼻烟壶象征着尊敬、和睦和友谊（这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习俗相似），是人们交往中珍贵的礼品。中国的匠师们在鼻烟壶的制作方面施展了“最完美的、难以想象的技艺”，特别是玉器琢磨的鼻烟壶，那丰满的构图和画面，使人感到在这种高硬度的玉石上操作，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1927年，时在四川做传教士的加拿大人沃姆斯利回加拿大休假，携带了他在华收藏的鼻烟壶。身为加拿大安大略中央艺术学院院长的海尼斯看到这批鼻烟壶后，立即对鼻烟壶上的精湛艺术敬佩得五体投地，从此开始了苦心收藏中国鼻烟壶的生涯。作为一名画家，海尼斯一方面收藏中国的鼻烟壶，一方面又把已经收藏到的鼻烟壶以水彩静物画的形式描绘下来，以文字注明这些藏品的造型、图案和规格，编成《中国鼻烟壶藏品画册》。海尼斯逝世后，加拿大国家美术陈列馆在评论中说，海尼斯还以收藏中国鼻烟壶而著名，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如今《中国鼻烟壶藏品画册》珍藏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善本书籍图书馆。当今世界的一些著名博物馆，如纽约自然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都收藏着为数不少的中国鼻烟壶。

以中国鼻烟壶为专题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也是在海外率先成立，1968年11月在纽约成立了“国际中国鼻烟壶协会”，有来自多个国家





的119位中国鼻烟壶鉴赏家、收藏家出席成立大会，而后，不定期在世界各地举行中国鼻烟壶研讨会，并出版刊物。多个国家的艺术品鉴赏家出版专著，对中国鼻烟壶作出了高度评价，比如法国学者里拉西里所著的《中国鼻烟壶收藏的奇遇》、美国学者史蒂文生所著的《鼻烟壶收藏手册》、英国学者休莫斯所著的《中国鼻烟壶》。世界顶级拍卖公司都将中国鼻烟壶作为一项常规的、重要的拍品，像佳士得、苏富比这样的拍卖公司经常推出中国鼻烟壶的专项拍卖。以1994年为例，上述两个拍卖公司在当年各举办了两期中国鼻烟壶专场拍卖，其中的苏富比竟推出一个料质鼻烟壶的专场，印证了美国人波谢尔早在1880年就提出的对中国玻璃制鼻烟壶的高度评价。2004年3月29日，佳士得在纽约推出了J&J“小有洞天”鼻烟壶珍藏（第三部分）的专场拍卖，88件拍品成交84件，成交率高达95.45%，总成交317.984万美元。这再一次证明，历经一百多年的市场检验，海外“买盘”依然对中国鼻烟壶有着巨大的兴趣。

鼻烟壶的收藏体会

中国大陆地区对中国鼻烟壶的收藏，至今还处在“小众收藏”的状态，市场对鼻烟壶的兴趣也是不冷不热，时冷时热，远远没有形成“板块产品”，没有旺盛的“买盘人气”。中国鼻烟壶真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因为至今国内收藏群体对中国鼻烟壶的认知度不够。现在的收藏潮流中，多是在看一件收藏品的“年头”（新和老）、“堆头”（大和小），或多或少忽略了这个藏品的“看头”（审美因素）。鼻烟壶的“年头”、“堆头”都是看不得的，只有“看头”里大有文章，所以“收藏新秀”们多是对中国鼻烟壶“不屑一顾”。

此外，一些著述也对鼻烟壶作出“误读”，形成了“误导”：比如一本初版于香港、后经版权贸易在大陆再版的鼻烟壶著作中，就十分武断地提出“民窑鼻烟壶大都无甚保值作用”。随后国内出版的一本鼻烟壶鉴赏与收藏的书中，又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写了进去。照他们的说

法，收藏鼻烟壶只能收藏“官窑”的、“御制”的。所谓“官窑”、“御制”，就是有“年款”，什么“雍正年制”、“乾隆年制”、“嘉庆年制”、“道光年制”，等等，依这样的指引没有年款的鼻烟壶就没有什么“保值作用”！而北京故宫研究中国鼻烟壶的学者则指出“中国的鼻烟壶大多没有款印”（《鼻烟壶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并提醒说鼻烟壶上的款记，多是后写款和新写款。笔者以为，如果机械地按“年款”去收藏，极有可能花了大价钱买到的都是仿品。以笔者藏壶玩壶的局限经验，感到“民品”中也是有“精品”、“极品”的。原因是制作“官品”的能工巧匠，是皇宫造办处从博山和广东聘来的，他们在北京完成了“计划经济”指标，制作完“官品”后，可以自由地回乡为私人工场和商铺工作。在同一工匠的制作下，“官品”和“民品”在风格、形式取向及品质方面，都十分相似。这样的道理也很简单，你不能说张大千在苏州画的画就一定比他在成都画的好！说“民品”不一定逊于“官品”还有一个理由是，在京制作“官品”时，工匠是按“最高”审定的“设计图”依样画葫芦，匠人的“灵感”和“灵气”是不容自由发挥的。回到乡下制作，一任自由发挥，巧来之思、神来之笔就大有可能。怎能说这样的“民品”“大都无甚保值作用”呢？其实在功利效应淡薄一些的“先前”，人们对鼻烟壶的收藏取向倒是宽容许多。1942年赵汝珍就说，一个鼻烟壶“质料如果确属珍异，作工又奇巧，无论它是何时生产，也不管它出自谁人之手，亦为上品。相反，质料平凡，作工一般，即使是康熙、雍正朝所造，为康熙、雍正皇帝所御用，也不值钱”。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两本书，也前呼后应地强调在选购收藏鼻烟壶中两大“法门”之一的“原装”标准，似乎要求一个鼻烟壶必须是原配的“壶身”“壶盖”和“烟匙”！对此笔者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提到的成对的“原配蟋蟀”。数百年前的烟壶主要是一种生活日用品，天天挪动，时时使用，哪有不丢这失那的。况且，还有一“出生”就是不完整的烟壶。《清档》曾有这样的记载：“乾隆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唐英将烧造的洋彩（珐琅彩）锦上添花各式鼻烟壶四十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进呈，奉旨：嗣后，鼻烟壶每年只烧五十，着其中不要





大了亦不要小了，其鼻烟壶盖不必烧来。”请看，当初制造时就没“原装”过，三百年后要我们这些爱好鼻烟壶的人去收藏那样的“原装”，真是比登天还难了。

当然，鼻烟壶上若出现残缺，也就失去了审美享受，笔者以为对这样的壶是不能收藏的。

审美第一，笔者坚信收藏中国鼻烟壶的标准亦应如此。在笔者有限的视野中，当今世界（已曝光的）鼻烟壶收藏家最知名的有加蒙斯基士夫妇、J&J（詹姆士·李与茱莉·李伉俪）、玛丽及佐治伯乐。笔者以为，以玛丽及佐治伯乐的藏品最具魅力，对于鼻烟壶的收藏，他俩拟定的准则有三个层面：“第一，也是最首要的，就是这些鼻烟壶须有莫大吸引力及极臻完美的艺术表现；第二，我们所搜集的都是独一无二或采用精致有趣的物料所制；第三，一些有重要艺术历史趣味的鼻烟壶，例如具有题识、年款、署名、制款及堂款，以及一切可丰富鼻烟壶之研究的资料，都特别能够引发我们的兴趣。”笔者对此收藏鼻烟壶的标准是深表赞同的。

有关中国鼻烟壶的时尚故事

自清初至民国初年的三百年中，吸食鼻烟，把玩鼻烟壶，不仅时尚，而且成为一种潮流，上自皇室贵胄，下到县吏乡役，富如豪绅巨贾，贫若行商走贩，都与鼻烟沾边。一是鼻烟能提神醒脑、驱寒除疲，有一定的治病作用；二是这玩意儿可上瘾，“吸之飘飘欲仙”，能满足一种嗜好；三是敬烟“赏”壶，既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磨合剂，又是一场公关交流的“前奏曲”。前人说得好，“友朋晤面虽有重要的事情要相商，也不能一开口就提出，必定要经过一定的谈天程序。谈天尚须无话找话，无词生词。相互交换观赏烟壶，便能生出许多话题，所以，赏鉴烟壶是非常高明的交际应酬方法。”当然，由于地位身份不同，贵贱贫富有所差异，吸烟和玩壶是肯定不同的。清代的鼻烟分为“彝、